

2987

成都文史資料選輯

第七輯

成都文史資料選輯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yt177/3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黄稚荃

封面设计：王傅文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302号

内部发行

成都二十六中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0.85元



“二·一六”惨案部分烈士原墓址棺椁



袁诗尧烈士遗像



周尚明烈士遗像



张澜先生遗像



李、闻追悼大会特刊和歌单（歌词见180页）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目录

一九二八年成都的二·一六惨案.....廖友陶 (1)

忆国立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

.....李保青、苏庚农、张星石、廖友陶、(26)

何正明、蒋梦鸿、陈凤梧

一九二八年长机帮工人罢工运动纪实.....李保青 (40)

关于“三军联合办事处”和“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

.....黄维德、万金裕 (44)

回忆一九三〇年的西南大学.....陈茂昭 (62)

回忆一九三五年华大反逮捕斗争

.....艾西由 李濠 徐康贤 (73)

一九三六年“成都大川饭店事件”内幕

.....熊伴云口述 邹慕记录整理 (82)

“成都大川饭店事件”纪实

.....成都科技大中共党史教研组肖志康、陈励冰 (93)

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成都的学生运动

.....贾唯英 王宇光 (106)

我所知道张澜先生在成都的革命活动.....沈自强 (133)

一九四六年成都“李闻追悼大会”纪实.....张松涛 (151)

我参与策划破坏“李闻追悼大会”所知内幕.....邵 平 (181)

我参与破坏“李闻追悼大会”暴行事件的经过

.....廖俊义 (194)

我对徐中齐一伙密谋策划破坏“李闻追悼大会”的见闻

.....易云谷 (187)

王干青 李筱亭 周列三同志在双流和成都

.....周铎编 周本纯 (197)

一九四六年西川邮务工会事件真象.....李 英 (214)

读者·作者·编者..... (218)

第六辑勘误表..... (224)

第八辑主要目录预告..... (222)

征要启事..... (225)

一九二八年成都的“二·一六”惨案

廖友陶

一九二七年，军阀反动派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后，蒋介石又在上海搞了“四·一二”大屠杀，接着汪精卫于“七·一五”在武汉叛变，第一次大革命，完全陷于失败，革命暂时走向低潮。但是，共产党和真正的革命者没有被吓倒，不断进行着壮烈反击。

在四川，成都的反动派跟着蒋介石镇压革命的脚步，制造了“二·一六”惨案，但革命的力量在党领导下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形 势

当时产生成都“二·一六”惨案的政治背景和形势是怎样的呢？

在“蒋汪合流”的前后，四川军阀一方面演出扯起国民革命军旗帜的“易帜”闹剧。一方面，刘文辉早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就派出第二师师长向育仁代表军阀们到南昌去投靠蒋介石，蒋派向为“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三月十六日，向回到重庆，同王陵基、石青阳、杨引之、蓝文彬、曹燮阳、申文英等，抢在“四·一二”之前，制造了“三·三一”惨案，残杀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和市民五百多人，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打先锋。

四月八日，国民党左派的成都市党部和各革命团体，为援助惨案受害群众，推举刘愿安等同志到二十八军军部请愿，时刘文辉在场。代表提出惩办凶手王陵基、曹燮阳等，取缔向育仁反动

活动和维持治安，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要求时，刘文辉说：“各位请惩办王、曹等，究竟有何证据，证明彼等系此案祸首？向育仁总办系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及本军代表，又得蒋总司令委彼回川主持全川党务。蒋总司令之军权，系中央党部所给予行使。如反对向育仁，不如直接反对中央党部”！邓锡侯也说：“近日省会忽发现农民自卫军总司令朱玺布告，同时发现三民自卫军总司令李廷布告，此两种主义不同的自卫军，随时都有发生冲突，扰害治安的可能。所以维持治安责任，要大家共同负责。明白点说，在青天白日旗帜下的成都，只有三民主义活动的领域”。第二天，刘邓共同任命向育仁为成都城防司令，此项命令叫嚣：“救国当循正轨……，狡黠者流往往剽窃美名，唱为高调。一夫攘臂，群众盲从……，暴乱之象，迭有见端……，省会地居首善……，难保无假借名号之徒，潜滋蔓长，乘间窃发……，倘遇上项情事发生，不服制止，准予便宜从事，用资镇慑”。就是说，他们要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便宜从事”了！

但是，当时的革命主流并没有退却。“三·三一”惨案以后，成都的许多工人、学生和中小学教师义愤填膺，要求参加革命组织、革命的党。以成都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反而出现了高潮。如像在北伐战争胜利前进时，党领导的“劳工联合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改组为“成都市工会”，由钟善辅、刘亚雄主持工作，原来仅辖有长机、生约、牛角等四十多个工会，通过罢工斗争的一九二七年，逐步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工会，会员达四万多人。在“四·一二”前夕，党提出“真正的革命政府应当保护工人利益”、“工人有权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工人阶级应参加革命政权”等战斗口号，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斗志。他们在市工会领导下，同两个黄色工会的斗争越来越尖锐。

当时，由老板和工贼组建的“四川省工会”在政客马云儒、律师李渊漠等操纵下，专门破坏工人斗争。如他们在长机工人取得“反朱尺”斗争的胜利后，即纠集工贼、流氓对长机工人召开

的增加工资的集会进行捣毁，并行内打人。又如由傅双无、刘辅之等人（从“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分裂出去的）所领导的“职工会”，自称中立，蒙骗群众，以削弱革命力量。刘愿安同志说过：“他们是我们面前的考茨基。对于公开敌人撕杀，好办，拼就是；对笑里藏刀的朋友，要提防他们暗算”。“三·三一”惨案后，“职工会”分裂市工会领导的工人，一度拉走建筑工会部分工人，经过宣传教育，受骗者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工会。

在“三·三一”惨案后，党领导工人和学生，联合各界组成“三·三一惨案成都后援会”时，市工会建立了纠察队，提出“打倒军阀，惩办凶手”的口号。到七、八月，反动派出动军警土匪，捣毁封闭市工会，边搜查，边追问工人领袖孟本斋、钟善辅、刘亚雄的踪迹。还在街上殴打、拘捕工人、学生和革命群众。党也领导工人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封闭了“省工会”。不幸孟本斋同志在斗争中被捕，被害于“军警团联合办事处”，这是巨大的损失！

二七年冬，反动派禁止在公路上推独轮车，党派张子瑜、李宗林、李保鲁等同志领导三万多独轮车工人大罢工，坚持到二八年春节，迫使反动派在公路两旁修建独轮车小道，罢工才胜利结束。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长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党派郭翼棠、李保鲁同志组织领导八千多工人罢工游行，把作恶多端，态度恶劣的“日月新”老板谢书尧和南府街街正的老板李祥兴押入队伍，到春熙路孙中山先生铜像前罚跪认罪，并在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之后，即迅速散队，胜利结束。

同时，教育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也正猛烈开展着。一九二七年，全川只有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和四川国专、法政、二专、农专、外专等七所国立省立大专学校。其经费来源，除成都大学靠“盐余”款外，其余大专学校和省立中学、师范学校、全靠“肉税”维持。但各地军阀都把他的防区以内的“屠宰税”，挪

作军费，拒绝调拨或只拨少数，以致教育经费十分困难，把教
员工的薪资搞成七折八扣，还不能按时发给，或发低值“杂板”
银元，甚至发“欠薪证”，一不兑现，即成废纸，以致教职员工
不能养家糊口，教育事业濒临破产，迫使师生奔走号呼；但军阀
们置之不理。同年底，中共川西特委发动、领导全市大中小学罢
教罢课，并组建了“成都学生联合会”，统一指挥。学联机构，
由各校学生会代表二人组成，计有成大李正恩、钱芳祥，师大苟
永芳、周国昌，法专龚堪慎、志诚法专郭翼棠，省一中汪恕中、
程思进，省一师葛人高（葛离开由石邦策替补）等；共推李正恩、
龚堪慎、郭翼棠领导学联工作。出版了“学生时报”，由成大陈
凤梧和省师陈平三负责编辑。会址设四川高等工业学校。

同年十二月五日，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军阀被迫召开
“教育经费独立会议”。教育厅长万克明和各校校长，“教职员
联合会”代表和学联的李正恩、龚堪慎、郭翼棠、苟永芳、汪恕
中、陈平三等六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万克明主持。在会上，
教职员代表历述苦况，要求迅速解决教经问题。学联代表谴责军
阀摧残教育事业，指明教经被劫，各校无法维持。并表示支持教
师，一致行动。刘文辉说：我的防区宽，支持教经独立。邓锡侯
也说：同意交出教经。至此，万克明说：“大家已一致表示维护
教经独立，各校必须马上复课”。学联代表表示：“刘湘、杨森
两军长态度不明，不能立即复课”！另外，为杜绝贪污教经，主
张废除教经收支机构，或由学联代表参加监督。万克明说：“不
能废除，学生亦无须干涉”。只许学联举监察委员二人参加。
并且，万克明和刘文辉还说：学生目的已达，应立即回校上课。
学联代表说：“教经独立，现在只是空话。目的远未达到，不能
上课”。万克明不让学联代表再发言。学联代表愤而退会。

学联代表退会后，立即在高工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群
众找万克明等说理。当群众进入“教育经费收支处”找万（他原
是二十八军的秘书）时，他态度极恶劣，同学们就押他到街上游

行。由学道街，经走马街、春熙路到中山公园，勒令他跪在八角亭自供罪状。他说：“政府无能，自己惭愧，对不起四川人民”。但当游行经过华兴街二十八军军部，他突然往内逃跑，群众跟踪涌进，被警卫逮捕了女一师张良璧、孙馨兰，法专徐启贵，女实校李玉春，工专邓俊、饶丰等六位同学，转送“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当晚，学联集合二千多同学前往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第二天即由有关学校保释。到了寒假，学生纷纷回家，把省城要求救经独立斗争的精神和要求带回各县，于是就扩大成全省规模要求救经独立的运动。

接着就是震动全川的反劣币运动。一九二五年，邓锡侯控制“四川造币厂”，铸造半元银辅币，每个只含银二钱五分，大大低于含银三钱二分的规定。于是大小军阀纷纷设厂仿铸含银量越来越低的劣币，以谋暴利，市民称“杂板”，充斥市面，金融混乱。在商学各界的接连抗议下，邓、田、刘为了敷衍舆论，命令“禁用劣币”，“严禁私铸”，然而铸者不理睬，照铸不误。到一九二七年秋冬调查，仅成都和灌县就有私厂十三处之多，银币贬值，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军阀们却无动于衷。当时流传一付形象而生动的对联说：“一块银元破哑假，三个死人邓田刘”！到一九二八年初，劣币多达三千万元，祸及全川！经济呈现破产危机，人民愤激，商界罢市，舆论指责，邓、田、刘才被迫通令禁止非厂造半元行使。

在人民水深火热时刻，中共川西特委组织反对劣币的斗争，由学联所属各校社团出面，联合各界团体百多个，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于省一师举行成都“反抗劣币大同盟”第一次代表会议。组建了“四川各界民众反抗劣币的大同盟”，举行了请三军长“捣毁私厂，由造币厂掉换劣币，禁止大元出境”的示威大游行。

反劣币运动日益发展，斗争锋芒直指军阀反动派。他们妄图把斗争控制在经济范围，进行武力镇压或多方欺骗。如国民党右

派的“成都市党部筹备处”，打出“成都市民众团体联合会”招牌，在旧省议会召开“维持银币讨论会”，公推向育仁为肃清劣币的总指挥等，来扰乱“反劣币大同盟”的工作。但在各校革命社团支持下，“反劣币大同盟”深得民心，纷纷要求“停止制造劣币”！“官价收回劣币”！声势越来越大。这个国民党“市党部筹备处”却唆使成大“健行社”发表“告民众书”，主张“遵从布告规定之各价与行使……”大唱反调。

“反劣币大同盟”进行斗争还没有十天，向育仁就出动军警在“少城公园”附近逮捕了散发传单的师大导社成员何家吉、刘茂，省一师赤锋社成员陈平三等。一月十七日，导社发表“为反劣币被捕学生宣言”，掀起了广泛的抗议。

邓、田、刘在“反劣币大同盟”坚决斗争压力下，派出王惠安为代表，接受三项严正要求，采取三项措施，表示让步。

这些党所领导，由李正恩、龚堪慎、郭翼棠等同志出面组织，站在前列的罢工，和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反劣币斗争等革命运动的胜利，震动了反动统治，使反动派找到口实，就动刀枪，制造震惊全川的“二·一六”惨案。而他们武装进攻革命运动的重点，又选择了国立成都大学。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个主战场呢？革命力量在成长着。一九二四年秋成大开始招收预科学生，党员何志远、李正恩、苏光弼在同学中很活跃。不幸何志远同志病逝，一九二五年贾铨入了党、党和团的组织继续在发展。到一九二六年下年，成大的共青团组织，除原有团员李正恩、钱芳祥、贾铨（子群）、苏光弼、廖云亮、张星石、梁造今、周家念等外，又新发展了陈际卿、何煦、周蜀西、罗世贞、王向忠、韩钟钦、苏友农等，由李正恩任团支部书记，领导学习，听政治报告，还自学理论书籍，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就要对外侵略的本性，也就必然扶植军阀作代理人，因而反军阀就要反帝。当时，成都的“赤心评论”已转化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同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成大同学声援五卅惨案革命运动中，

由党领导共青团发起，组建了“社会科学研究社”（简称社科社），很快发展到有四十多位社员，七、八人编一个小组，每周学习一次政治，认识新三民主义，贯彻三大政策；也要认识国家主义派倡导“教育救国”，不提反帝反军阀，是模糊斗争对象的捣乱。正在这时，投机分子易光谦看到北伐战争胜利，请求参加共青团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南十六区分部，受到拒绝。他就勾结“赤心评论”分子陈紫舆等把持的国民党市党部，批准他们在成大建立了“南四十一区分部”，还建立了个外围组织“健行社”。在这年改选学生会的大会上，“健行社”勾结国家主义派的“惕社”，突然袭击的夺去了学生会领导权。从此，社科社就有个尖锐的对立面“健行社”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旬，出现了大较量的公开学术讲演的斗争。经过是这样的：成大开学不久，正在国家主义派曾经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辩护过的“三·一八”惨案快到周年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快要来临的日子，“惕社”为欢迎头目李璜来成大任教，向学校借用礼堂，以扩大政治影响。社科社听说后，向学校建议：“既要在学校公开讲话，大家都讲”。于是张澜校长决定：三派学生组织都请专家主讲，开成学术讲演会，以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还表示校长要亲临听讲。社会团体和各校师生听到消息，都热心支持这次行动，以纪念“三·一八”的斗争和庆祝“五·一”节。终于在致公堂举行了这充满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学术讲演会。张澜校长、不少教授、社会团体、社会人士和外校师生约一千几百人到会，盛况空前。

学术讲演会开始，李璜先讲，说：国家风雨飘摇，说什么民权、民生？侈言而已！至于共产主义，更是黄粱美梦，脱离国情，害国、害民，害己！

“健行社”请的是杨吉甫教授，主要讲：国家主义太狭隘，共产主义太遥远，路子走不通。只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能实行。

社科社请的是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安同志，最后讲，主要说：“我讲的题目叫‘乡坝佬进城看告示’……我也想讲国家主义，像刚才李先生讲的，要国家独立富强，这很好嘛！只是怎样才办得到？对谁要独立？由谁争独立？又由谁来建设？又怎样建设起富强的国家？我没有听明白李先生怎样说的，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当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不讲反帝反军阀的国家主义，真有点不好讲……杨先生又告诉我们，只有三民主义合国情。对！只是，我想：这个三民主义，恐怕应该是三年前孙中山先生‘真释’过的新三民主义，是要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的三民主义，就是要联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要联合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工农大众的三民主义。直到中山先生逝世，他老人家还用遗嘱叮咛人民：‘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想去想来，只有中山先生这样的指教和政策，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争得国家独立；有了独立，又打倒了依赖帝国主义作恶的军阀，要建设富强的国家，也还要依靠工农大众。要真正发动和组织工农大众，还是只有联合中国共产党。既然要联合中国共产党，联合苏联，只好讲国际主义，同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互相支援，共同奋斗，也才能够真正反帝建国。同全世界人民一起，建立一个和平、平等、民主、幸福的新世界。道理和事实不是这样的吗……我的话粗俗，请原谅”。刘愿安同志刚讲完，张澜校长立即起身，掀髯欢笑，带头鼓掌，连声赞赏：“讲得好！讲得好”！全场鼓掌，热烈赞誉。经过这次学术讲演，社科社社员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不久，向育仁在重庆勾结王陵基等制造“三·三一”惨案后，来到成都，就打出国民党“整理党务特派员”的招牌，组建了个“成都市党员登记委员会”，又由“健行社”的易光谦担任委员。成都的政治形势开始逆转了。

在这斗争转折过程中，四月十三日午后，中共成都市委书记

刘愿安同志在岳府街铁路公司，召集成大全体团员，报告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军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序幕。今后，革命斗争是艰巨的、长期的，党领导革命的任务更重大了。经上级研究决定，成大全体共青团员都升转入党，设立党支部，由李正恩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从此，社科社就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战斗了。

四月二十四日，在向育仁策划指挥下，易光谦伙同反动工会的工贼刘辅之和刘嘉惠等，举行了反革命的“成都农工商学兵清党示威大会”，贴标语，呼口号，反对国民革命，反对国民党左派，捣毁成都总工会，还要捉拿共产党人刘愿安、钟善辅，要迫使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转入地下。对这些反革命行动，社科社的同志们非常反感，在成大校内进行着反击：一面张贴郭沫若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还张贴武汉国民党中央讨伐蒋介石的文告等；一面又张贴墙报，揭露“健行社”分子投靠军阀向育仁，到各县担任国民党党务登记委员（如健行社骨干周克谋到崇庆县担任这样的委员），搜罗地主官僚土豪劣绅，组织反革命集团，破坏革命的罪恶。这使易光谦等辈对社科社的领导干部加深了仇恨。首先，由易光谦以国民党党务登记委员会名义检举成大学生钱芳祥、李正恩、王向忠、钟铁云、苏光炯、韩钟钦（后叛变，改名伯勋，成了大特务，解放后，镇压了）等六人为共产党员，请伪省教育厅转函三军联合办事处，通缉法办。到七月，终于由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派便衣谍查员在皇城门口，把李正恩同志非法逮捕。幸好有同志看见，报告学校。

（同时，在通俗教育馆工作的少年俱乐部成员巫俊受也碰见了，当时他到刘愿安同志家中汇报，党就迅速采取了营救措施。）学校派熊晓岩作代表，向伪军警团联合办事处提出质问：一、李正恩是成大在校学生，即使应逮捕，也应事先通知学校，由学校交人；二、如说李正恩是共产党员，应提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证明和所作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事实证据；三、此种无犯罪证据的非

法拉人行动，使成大学生人人自危，身体自由无保障，不能安心读书，影响学校教育正常进行。希望立即释放，否则将事实真象公诸社会舆论评议。结果，关押了三个多月，才由学校把李正恩同志保释回校了。

这年九月，成大招收了两年级的预科学生，其中转来党员王宜昌、刘力生、钟汝勤；又陆续发展新党员吴子哲、杨国文、王道文、周绍尧等。支部就有党员二十三人了，经上级决定，扩大为特支，书记钱芳祥（李正恩同志被捕后改选的），增设副书记一人，联系组长，保管文件，选苏友农担任，王向忠任宣传干事，廖云亮任组织干事，分设三个小组。共青团也转来团员程自鹏、吴启慕、张荣笏、杨尚棣、何加惠、廖季文（友陶）、王定鹏、苏灿瑶、唐宗甫、彭文伯等；又陆续发展团员陈先河、任志俊、姜炳兴等。团支部也有了二十多人，组成了团的特支，由程自鹏任特支书记，廖季文任组织干事，吴启慕任宣传干事。也分编三个小组，每月举行团员大会一次，由党特支副书记苏友农出席指导。这样，党团员在社科社的领导骨干力量更加坚强了。

社科社的社员也发展到了二百多人。党、团、革命群众组织这样的发展，是由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浪潮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觉醒和热情，并未受“三·三一”惨案和蒋汪背叛革命的影响，反而不顾生命积极投身革命组织，社科社也因而大发展了。党、团领导社科社加强革命理论学习，以巩固组织。首先修改了社章的宗旨，明确提出以唯物史观为理论的指导原则，研究社会革命的实践方法。还规定了学习书籍，分编社员小组，每周进行学习，报告和讨论读书心得，大大促进了思想觉悟。

秋季的成大学生会改选，社科社又同“健行社”和“惕社”展开了墙报形式的激烈斗争，王道文、王向忠、胡景璩、韩钟霖等辛辣的语言，沉重的打击了那伙反动派，使他们愤恨极了。加上军阀反动派正千方百计伺机镇压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组织，“健行社”的反动分子吴人初（子刚）、周伯村在一九二八